

前 言

文潔華

本文集並非會議論文集，部分作者應邀為本文集的主題作思考及撰文，雖然其他作者曾於2013年2月，出席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主辦的「香港廣東文化的未來」學術研討會，並曾就有關議題發言及參與討論。

該次會議確曾帶來很大的迴響。與會者十分興奮，能在學術會議的場地及規模下，「堂堂正正」以廣東話及英語發表論文，並進行交流。我們應該反問，為甚麼會有這樣的心理出現？為何以自己的母語發表論文是一項「例外」？為何用英語發表會有心理負擔？箇中各種複雜的因素當然可以列舉，包括發表的語言連論文會怎樣被評估；能否說「標準」的英語或廣東話；以廣東話發表的論文會否被認為準備不足……，還有其他於本文集中談及的語言、身份及文化政治等問題。

本書以香港粵語文化的異質與多元為主題，先從粵語文化在香港的再現現象作展示。範圍順歷史進程先有香港藝術館前總館長朱錦

鸞對鄧惠麟的研究，闡述曾居新界的廣東氏族鄧惠麟如何以個人及家族收藏的廣東翰墨書畫等，見出廣東文脈在香港地區的流傳情況。於此部份還有余少華談廣東南音「師娘腔」傳人梅姨；黃仲鳴如數家珍抗戰後香港的粵語小說；盧偉力談黃飛鴻粵語功夫片系列；鄭威鵬討論香港當代粵語劇場；以及戚夏蕙述說Cantopop的興起與嬗變。

但每談一種語言文化，便有使用該語言於日常生活中遇上的族群關係與社會位置。於此，本書特設一個在香港鮮有探討的種族議題：「粵語大眾、少數族裔與新移民」。陳錦榮在文中提出要反思廣東話的議題跟其他生活於香港的少數族裔之間的張力。梁旭明則以學校個案，探討如何在公開考試的中文要求和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之間，為少數族裔學童設計較為順適的語言教育。何偉業則以數據討論外籍傭工在香港如何因粵語能力構成了「工作資本」，以及彼此的差異。陳允中更貫徹地以粵語撰寫論文（此舉在學術書籍裡十分罕見），應題地探討香港有沒有標準的廣東話。

最後，「粵語聲張」的分題直接地談論語言與社會身份的關係以及文化政治。鍾寶賢為歷史學家，重提國語運動對大戰前後香港粵語電影業的打壓與交鋒，這明顯是一場埋身的文化戰，但粵語電影依然「風吹草又生」。馬傑偉與許寶強均回顧了自己的學術生涯，如何在教學及進行本土研究中迎接不盡不實的所謂「國際化」政策、英語教學及研究出版的要求，並看出其利弊。本書以許寶強「廣東話授課與情感教育」的思考作結，雖然並非書的主要結論或定調，但卻也是不少香港學者的心聲。

本書匯集了饒有意義的研究發現及成果，見證了粵語文化在香港的蓬勃發展，以及其中的異質與多元。編輯的進行，同時兼顧了歷史的進程、素常被忽略的事件及課題，以及對全書主題的自我反思。

現以編者的閱讀撮要，展示相關的內容。

本書特以朱錦鸞博士以書畫家鄧惠麟為廣東文脈之一線在香港地區流傳之研究，展開本書主題的討論。朱博士指出香港秉承的儒家文化，可上追至宋代南來，後居新界之鄧、侯、文、廖及彭姓等氏族。鄧惠麟之祖先於開寶六年(973)自江西吉永南移，後於本港元朗錦田築力瀛書院，建藏書樓，傳承中原儒學。鄧氏及其他廣東大儒之書法、拓刻及翰墨遺跡等，被夏村鄧氏宗祠所保存，並如朱博士所言，成為今天研究早期香港美術史和整合廣東文脈在香港地區發展的重要資源。朱錦鸞在文中以其於田野考案中拍攝所得的文物真跡，分析峭勁的書風、文辭及工藝語言，結論出嶺南文人精緻的品味，如何曾在香港元朗地區展現及承傳。鄧氏宗祠(友恭堂)之楹聯和匾額，如朱氏所言，亦體現了傳統氏族的體制及家庭尊卑倫理的等級思想。作者檢視了「友恭堂」陳列的其他重要的文人政客之遺墨，分析溯源至宋明理學主張的為人及治學理念，後及晚清廣東之學風及代表人物在香港實踐的教育及活動。朱錦鸞指出，即使英殖民政府對新界的租借及管治，曾使農村士紳努力保存的廣東文人文化被邊緣化，唯鄧惠麟等人仍應為早期香港藝術史的代表人物。其論點是香港藝術史為香港文化史之重要一環，像鄧惠麟等如此努力教育及承傳嶺南藝文精萃的人物，不應在香港美術史觀裡「失焦」。

余少華好幾次跟我提及梅姨。這次他撰文紀述及研究他所心儀的這位「師娘腔」南音承傳人，除了藝術造詣上的肯定以外，還要為香港文化史補上經常被人遺漏的粵曲、南音的一章，因而批評及觀察的意味濃重。他善用了文化研究中「逆向幻覺」(reverse hallucination)、「消逝」(disappearance)及「蕭條」(decadence)及「類型城市」(generic city)等觀念，描述南音在殖民地及後殖民香港的萎縮。說蕭條萎縮，

自會回溯粵曲南音、龍舟、板眼於上世紀初至下半旬之全盛期，以及像梅姨這些能唱並做業樂業的師娘腔南音傳人，如何曾唱遍省、港、澳及至大氣電波。此文討論之特點便在廣播、流傳與接受，以及在本地廣東大眾的生活空間中曾喚醒的多層重要的文化記憶，包括南音所喻表的由清末民初至今的粵語音樂文化。余少華亦汲納了當代文化研究對消隱自身文化的觀察，以及音樂、母語與身份建構的關係，嘆惜粵曲如今被標籤為「長者音樂」。余少華把梅姨（吳詠梅）的動人故事放置於香港的大歷史。「小故事」其實也是二十世紀下半葉香港民間音樂的重要聲音，梅姨地水南音「師娘腔」的承傳功業與感染力，足以跨越年代與地域的距離，成為港澳粵文化的經典。

黃仲鳴以「亮麗的風景」來形容抗戰後香港粵語小說的盛況；從他異常豐富的研究資料看來，亮麗的意思十分恰當。亮麗之一，乃這批以方言創作的小說寫作中，粵語及白話文的結合。黃仲鳴在文中提點出有關作品的不同路線、刊載方式以及代表作家，如何在一九五〇及六〇年代中亮麗。文中亦以高雄（三蘇）、周白蘋及我是山人為最值得研究的本地作家，並主張以語法、語句、語境以及作品風格來斷定「粵語文學」。閱罷本文以及其中的引文段落，讀者也會如我一般，非常渴望手中可有一本文中評述的三蘇的「經紀日記」，黃谷柳的「蝦球傳」和周白蘋的「牛精良」；看這些作品如何把方言、白話文與文言文「搓揉得如玩魔術」，又如何滿足一九五〇、六〇年代香港粵語讀者的脾胃，並寄情於抗外復族與慰藉鄉愁，同時以廣東方言「譏世諷俗」（劉紹銘語）。粵語小說的場景雖然不過是閃亮一場的方言文學運動，於一九五〇年代由內地留港的一批左翼文藝工作者為推廣大眾文藝所鼓吹，唯其所催生的三及第文體與健筆，如黃仲鳴的分析，直至一九七〇年代末，確曾撫慰不少香港粵民及非粵人讀者的心靈，並陪

伴他們「順適」於香港。文章並帶出了語言文學的純粹性與混雜性、典雅與通俗的爭議與思考。

粵語片黃飛鴻系列跟「如來神掌」一直是盧偉力的最愛，其中的想像縈繞著他的童年，因而書寫「民風與世俗——五六十年代香港粵功夫片的文化想像」一文，資料豐富，疾筆以成。文中列表數量一九四九至一九七〇年「黃飛鴻電影」的產量，而以一九五六年為最，年產二十五齣，跟社會狀況及民心所向（提供了難民潮定居後所需要的倫理空間）等，不無關係。盧偉力更以西方類型電影理論中之原生、典範、修正及仿諷等四個階段，平行閱讀黃飛鴻電影之形成期（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代中），定型期（至一九六〇年代始）以及再確認期（至一九七〇年代始）。黃飛鴻多元地再現了廣東文化，包括地方色彩、民間藝術（舞龍舞獅）、廣東傳統武術以及武德等。但盧偉力主力著墨於情節中的儒家倫理，如何在忠、義、孝、恕及寬容之間作出平衡。盧偉力指出作品系列因應殖民地香港的情況，獨缺「國家機器」；唯贊同說一九五〇年代的黃飛鴻粵語電影，曾為移居香港甚至海外的廣東人，提供了一個慰藉及緬懷廣東文化的情味。此文因而為本書之第一部分（廣東文化再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共同記憶。

從粵語電影到粵語話劇，劇評人鄭威鵬（小西）特為本書撰文討論香港當代的粵語劇場。從粵語話劇到粵語劇場，鄭威鵬首先提及一種不鼓勵以粵語寫作劇本的意見，即以方言為通俗（有別於黃仲鳴所記述的亮麗的粵語小說）。他繼而觀察香港話劇後來趨向「劇場性」及表演性的發展，即創作人有意識地呈現演員表演的內在狀態，包括語言性與非語言性如身體、聲音聲線，以及道具舞台效果等，以期更能掌握演出戲劇的本質。如此說來，香港戲劇不再限囿於語言或方言。鄭威鵬指出其走向劇場性的發展，正如香港劇場工作者陳炳釗所

言，可「拆穿既有語言的幻象，打開新的感知與對話的空間」。唯文章結束之際，鄭威鵬又強調在全球化年代，眾多語言共同喧嘩，語言自身的表演性日受重視，但又努力在抵銷彼此。於此他提出本書重視的粵語主題，問香港當代劇場中的「粵語」，特點何在？其又體現了怎樣的靈性與存在狀況？此等能否在本地劇場的表演性實踐中有所反映？編者甚望他在文章不得不結束的「在此打住」的相關討論，真能引起拋磚引玉的效果。

戚夏蕙的論文，探討Cantopop裡的廣東歌詞，自一九六、七〇年代以來主要的粵語文化的再現，如何表達香港小市民的心聲。文中自有相當的篇幅，閱讀許冠傑的草根歌詞，以及其直入歌詞的廣東話。許氏歌曲的傳神度，來自他對香港本土生活的觀察，對普羅大眾的眾生相，繪形繪聲。唯戚夏蕙由許冠傑說到My Little Airport的廣東流行歌詞，反映了不同年代廣東歌的關注。戚夏蕙說許冠傑的廣東歌，是「當代順民的寫照」，提醒生活逼人，與其怨天尤人，不如「嗶嗶聲即刻搵嘢做」。然而到了二千年的香港廣東歌獨立樂隊，則以大量的港式粵語，從個人當下的瑣碎事開始談起。當中的私密或以小故事說大歷史，跟同時期的視覺藝術表現方式相同，分別的是表達的語言而已。時下獨立樂隊說的，跟七〇年代的Cantopop有何不同？戚夏蕙指出了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簡單說來，在大財團霸權的社會，生活的困局是結構性的，不再是個人肯捱或努力便可走出困境，這催使他們毅然以行動戳破香港的神話，不再當許冠傑的順民角色。

陳錦榮教授在「廣東人不感陌生的陌生人：香港少數族裔的陌生化」一文中，指出所謂「香港身份」或「香港廣東性」的探討，依然是忽略了對族裔及種族差異在本土的身份政治及角色上的關注。在有關「誰是陌生者？」的思考上，作者以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Simmel)的

理論，說明「陌生者」產生之社會功能。有關的想像經過從正面到負面的階段，由對「內在者」有利的位置到負面的陌生性，包括二十世紀言說的「外地勞工」或「非法移民」。陳錦榮明言自己的關注，即南亞少數族裔「如何被規範、被構成、被次級化，以及被隱形於以香港廣東性主導的固有論述之中」。作者的觀點，在正正以「香港廣東性」為主題思考的本文集中，是非常有力的提醒。陳錦榮提到香港的粵語人口，在以排斥的態度對待陌生人以致內地人時，所標榜的依然是所謂「錯誤」的廣東口音。言下之意，當本文集部分作者聚焦地討論香港廣東性或陳錦榮所說的「香港本體性」的同時，應自覺到過度的自我識別，會如何模糊及隱沒了香港的種族組成及差異。作者說本地學術界對種族與種族主義之間的張力，探討嚴重不足，還不時在舊文化理論的沿用下（如「混雜」理論、「眾聲喧嘩」等），進行陌生者的政治理論。我們顯然可以在本文所提供的種族問題視點下，對文集的主題再作全盤思考。

梁旭明的討論從人口結構堪稱為族裔上較劃一的香港，其中華裔仍佔百分之九十五開始。一九九八年施行的母語（中文）教學政策是一種同化政策，違反了國際公約中謂應以多元化的機制促進少數族裔自己的民族認同。梁的個案研究在有相當少數族裔學生的地利亞學校進行，檢視指定學校如何隨著母語政策以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為少數族裔學生度生訂造教材，內容旨在使他們成為「有效公民」，並在教材上「去少數化；以香港為家」。此等教材著重粵語發言及中文書寫，以語言教育為少數族裔學生建立身份認同。梁旭明指出在多元文化的香港，仍可以在教授中文的同時，於課程及學習設計上，體現社會生活中的文化差異及文化偏好。地利亞學校的教材設計使得同時應付香港中文公開考試制度，使中文與少數族裔的教育相關，提高他們

的中文能力，並同時使他們認同自己的雙文化身份。文中描述的在香港人口比例相對上零碎的非華裔少數種族，需要特殊的教學設計，使此等學生在所謂母語教育（粵語、普通話、中文書寫）的政策下具相當的競爭力，又同時能達到多元化教育的理想。

何偉業的研究涉及近日備受社會關注的印尼傭工涉嫌受僱主虐待的連串事情。他以印傭言說粵語的能力，檢視印傭在香港的待遇，並探討其成因。一般印象為菲傭善用英語，教育程度較高；印傭因為多被僱用照顧長者，因而於就業前有接受粵語訓練的機會，構成了她們在香港工作較為有利的生存資本。唯有關的培訓過程，亦造成了她們沉重的債務。粵語作為印傭「賴以生存的語言」或工作資本，在她們來港工作以後又得到進一步拓展，使她們在外籍傭工中間造成了差異。唯語言障礙的減卻，未必就能使她們得到較佳的待遇，轉而造就了的，是她們與僱主家中不同年紀的成員的特殊情感與交流。此文的調查數據與觀察分析，展示了本地少有的對種族的關注與思考。

閱讀陳允中的「香港有標準的普通話嗎？」是一項粵語挑戰，得佩服他以全粵語口語書寫的能力，又全然享受其中聆聽的樂趣以及親切感。文中的論點說明了他於本文中的書寫策略。全粵語書寫雖然甚少於中文論文中出現（編者便未曾遇見過），但這項嘗試或選擇，事實上回應了文章的內容，且不言而喻。陳允中是社會學家，又是融入香港的新移民（馬來西亞籍華裔），觀察到香港基層相對於中產，少有對「標準」廣東話的要求，對鄉音及普通話的包容力強，皆因以團結共處和互相幫助作為生活的基礎。他觀察了不同群體（專業及菁英者、內地高等教育工作者、荃灣、灣仔基層街坊、新界菜園村）裡的語言情況，結論說回流菁英沒有本土化的壓力，多用英語而少用本地語言，有別於香港基層以廣東話為主。但基層街坊言說的廣東話則

非常多元，包括夾雜著各種鄉音之廣東話，根本分辨不出有所謂標準的廣東話及俗語，亦無所要求。陳允中認為生活所需與語言策略息息相關，街坊對不同語言或廣東話的包容，在於團結就是力量，以便爭取各種共同利益。基層每逢有溝通的困難，都會努力學習用對方慣用的語言，或互相幫忙翻譯，務求避免因語言差異而「礙事」。另一項重要的結論也依據著同一思考：即語言政治與社會關係。他認為香港人之反新移民情緒及本土意識的提高，其實在乎香港人自身與中國「鄉下」的聯繫。關係的疏離，會視帶鄉音的廣東話為「不標準」，忘了它原來的多元化與包容性，見出高舉本土標準的語言，實為了製造差異的身份政治。

鍾寶賢以鉅細無遺的考據，於「母語運動與大戰前後的香港粵語電影業」一文中，紀述粵語電影史重要的一段轉折。鍾先追溯至清朝中葉的國語正音及語言統一運動，這政策於一九三〇年代令蔣介石頒令有聲電影要以國語製作。然而在同一時期，粵語文化也非常蓬勃，特別在東南亞及中國沿海各埠之粵語聲片，或把粵劇拍成電影等，兩種媒體亦互相交流，甚至於引進西方語之粵語譯名。有關現象跟「國語統一」之官方政策發生了正面衝撞。多番協商無效以後，國語片在中日戰爭中癱瘓而給了粵語電影生存的空間。但好景不常，鍾寶賢的記述道出了粵語電影二次世戰前後的數度起伏與艱辛，直至我們較為熟悉的一九六〇年代。她分析的地區情況遍及東南亞；包括當中如星加坡於一九六六年推行的母語政策，如何令蓬勃一時的粵語電影下滑。鍾寶賢亦分析了「中聯」與「光藝」公司兩個粵片傳統與品類，讀者亦重溫了多齣曾影響一時的電影名字與演員。文中並帶出了年代之交香港人口結構的急速轉型、經濟漸趨繁榮，跟粵語電影裡場面變化的對應，以及被接受的狀況。電影的題材逐漸融入了本地通俗小說的

家庭倫理，愛情叛逆以及個人主義等，見出跟生活場境的息息相關。

馬傑偉於「本土教學與研究的語文政治」一文，提及到香港高等教育工作者身同感受的教學及研究掙扎。不少學者如今依然在「重英輕中」的壓力下作出調適，包括怎樣以英語教授中國文化的題材，如何在中文與英文的學術出版裡作出取捨。此等掙扎皆因本地大學今趨向採用的全英語教學語言政策 (MOI, medium of instruction)，以及以英語出版等同國際級出版的考量。馬傑偉在文中以個人經驗及具體事件，整理出英語、普通話及廣東話在香港學界中的複雜互動與角力。他的結論概括且非常中肯，包括以廣東話思辨本土議題，較能深入文化的基本並激發學生學習的志趣；以英文作學術書寫，可借豐厚的西方理論透視本土課題；以中文寫作累積的論文，可裨益於本土學術的發展。馬傑偉強調母語作為文化肌理的重要性，並肯定廣東語為生活的「生命體」，事實上是本土研究的原材料。他主張借用英語學術的資源，又倡議以廣東話教授本土性強的科目，並提倡努力在大學體制內外，開拓粵語討論以及中文學術書寫的空間。

本書以許寶強的文章，談廣東話授課與情感教育，結束本書的討論。許寶強坦然放棄母語授課對不少本地教育工作者所曾帶來的苦悶、恐懼、羞恥甚至犬儒等心理狀態。母語或中文教學在香港並不曾達到過一致的共識，更莫說以廣東話授課，其中的複雜心理跟殖民地的職場或對畢業後工作前景的憂慮，不無關係。許寶強回顧自一九六、七〇年代以來的教學語言政策，至一九九〇年代的「國際化」，如何成為本地高等教育的議題。許寶強分析了二〇一〇年教資會發表的「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報告書，見出其中「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之取向及有關的種種關注與政策。許氏指出此等構思視英語授課為國際化的指標，並無助於本地與非本地生的融合，達成國際化的效果，甚至會令部分學生失卻自信及學習的動機。文章並帶出了甚麼是「教育」、何謂「語言」以及

「語言能力」等基本思考。許寶強以波蘭尼(Polanyi)「所有知識都只能是個人的知識」的理論作結，強調教育設計必須因應「在地」的社會脈絡，並致力於學習的情感與熱誠。他提出以母語學習為前提，進行培育情感及學習的生活動力。

執筆此編者序文之際，剛巧出現了一宗語言事件，再次說明了語言、身份與文化政治的關係。香港教育局在其「語文習慣支援」網頁中，被發現將廣東話注解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引來不少抨擊。教育局隨後予以澄清，說：「廣東話是大部分本地人的母語和中文用語。教育局致力提升學生兩文三語的發展。」

這現象印證了馬傑偉及馮應謙在「香港身份認同研究的時代意義」一文中，回應批評者認為談香港人身份及其認同的研究，不過是一個無中生有、創造出來的偽命題所指出的：在這段九七前後，探測港人對自己所屬文化的認同感及其中的微妙變化，其實對學術甚至政府的民生及文化政策，都別具參考的價值。兩位作者均認為國家、民族及社群的認同感，是歷史及政治的進程；箇中因素複雜多元，各有不同歷史背景及價值取向。這也正是本書訂名為「粵語的政治：香港粵語的異質與多元」的原因。在香港文化身份會否成為「偽命題」的歷史階段之前，本書正好也記述了香港文化身份蛻變的不同篇章。

本書之所以順利出版，得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楊靜女士的專業指導，香港浸會大學學術研究委員會的資助，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同事的參與討論及鼎力支持，還有博士生梁湛琛先生的主要統籌及聯絡工作，謹致謝忱。

文潔華

2014年2月14日謹識於香港